

# 第一章

中国股市·雄关漫道真如铁  
·历经风雨成大器

潮起潮落 来去皆匆匆。

伴随着风风雨雨，伴随着犹豫与彷徨，中国股市走过了 10 年历程。虽则步履蹒跚，但却异常坚定。

有那么多的惊涛骇浪，延伸在中国股市发展的漫漫道路上；

有那么多的悲欢离合，延伸在难割难舍的做股行程中；

我们见到的，也许不只是美好的风景，

我们听到的，也许不只是曼妙的音乐。

总结十年股市历程，我们总感觉到这样一个特点：

有喜就是大喜，有悲就是大悲。其结果就是大起大落。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股票，终于成为我们社会生活的一部分，我们的股票市场已经是有章有法，成绩斐然。

光阴荏苒，今又牛年。香港回归，十五大召开。我们分明已看到，牛气已聚，牛步已起，来迎接两大利好消息的到来。

中国股市 又是一个艳阳天！

## ● 陌生的异乡客 股票 走进了中国人的生活

50年前 毛泽东曾说：“敌人一天天烂下去 我们一天天好起来。”不言而喻 这个“敌人”就是指帝国主义。

中国人上上下下都在谈论足球何时能踢出国门，而另一只被中国人忽视的足球 正飞掠 300 多年广袤时空 向中国嚯嚯生风扑来……。

有一个问题 十年前我们无法回避：“既然资本主义没有象预见的那样迅速死掉 那么饱经困顿、创伤的社会主义 该不该开辟新的道路呢？”

其实 我们早就应该知晓 股票的出现 缓解了资本主义的痼疾 即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与生产社会化的矛盾。

不知不觉 股票 这个异乡客又一次进入了中国国门。

锈锁开启 艰难的起步。

北京人民大会堂。纽约华尔街。各自具有不同的象征，又各自拥有独立的政治概念。

纽约证券交易所，可以说是美国这个金元帝国的金融中心。主管这个金融中心的就是范尔霖。

1986年，范尔霖先生应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的邀请，前来中国访问。

中国改革与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向这位华尔街的金融巨人伸出了友好之手。

11月14日，中国人民大会堂。邓小平在这里亲切会见范尔霖。作为客人 约翰·范尔霖先生赠送给邓小平一枚精美绝伦的证章——纽约证券交易所所徽。佩戴着这枚证章，可以在戒备森严的纽约证券交易所里畅行无阻。

国务委员，当时的中国人民银行行长陈慕华代表邓小平回赠给范尔霖先生的礼品则是一张股票——中国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证券交易部代理发行的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的股票。

这是一个不平凡的时刻。它不仅意味着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拥有了在华尔街畅通无阻的通行证，也不意味着世界上最大的证券交易所董事长获得了新中国首次发行的一枚股票。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它预示着一把锈蚀了 30 多年的铁锁即将开启，预示着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迈出了非同寻常的一步。

随后在上海国际金融研讨会的闭幕会上，中方将 16 张上海电真空公司的股票作为上海市的特殊礼物，赠送给了美国国际集团董事长格林伯格、前国防部长温伯格、美前财政部长威廉·西蒙、法国里昂信贷银行副主裁菲利浦等 16 位外国代表 连同范尔霖先生的股票 上海已有了 17 位洋股东。这不仅仅是一种礼遇，而是一种象征。

这毫无疑问地向世人昭示：中国，一个拥有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大国，正在进行着一场静悄悄的金融革命。中国股票市场的复苏，正以其不可抗拒的、神奇的魅力撩拨着中国人的心。

股票，有人称之为放出去而收不回来的魔鬼。然而确切地说，它是现代经济社会的魔术师。它可以在顷刻之间挖掘出社会的经济潜力，使生产和建设迅速发展；又可以排山倒海之势引起现代社会的经济动荡，使生产和建设在一夜之间陷入混乱。有时，它会在人们最不需要钱的时候，使各种资金蜂拥而至，而又在人们最需要钱的时候，使现成的资金飘忽得无影无踪。

今天，不管是股市弄潮的幸运儿，还是套牢割肉的倒霉者，那种对股票的埋怨与咒骂已很少再闻；相反，更多的人已经认识到，股票是一个国家经济机器的润滑油。人们把它比做天使，经济时代的宠儿。当然中国也不能例外。

也许就是现在 我们许多精通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

还不知道马克思与股票还有一段亲密的关系。

那是 1864 年。由于长期的伏案写作，贫穷和拮据长期困扰着大师的家庭。贫穷使得他和燕妮的孩子不治而去，拮据使得一天之内三个债主带着黑雨秋风轮番上门。马克思需要钱，他深知在金钱的驱使下，一张桌子也会热烈地起舞。当时正值英国股市生机初显的时候，由于没有一点起码的起动资金，马克思只能说：

“假如我在最近几天内有钱的话，我就可以在交易所赚到很多钱。现在，在伦敦又到了可以靠机智和少量资金赚钱的时候了。”

恰巧，马克思的一位老朋友威廉·沃尔夫不幸逝世，在他的遗嘱中，他把自己毕生辛苦挣的六百英镑赠给了马克思。马克思立即把这笔款项投进了股市。

当时股市的繁荣，使马克思炒起股来同他这位大手笔做小文章一样得心应手。这在他的一封信里反映出来：

“医生不允许我从事紧张和长时间的脑力劳动 所以我——这会使你大吃一惊——就做起投机生意来了。一部分是做美国国家有息证券的投机，但主要是做英国的股票投机。今年英国股票如雨后春笋般增加起来，（这些五花八门的股份企业，它们扩充到不可思议的规模，然后又纷纷倒闭）。我就用这个办法赚了四百多英镑。而现在，当错综复杂的政治局势又给投机大开方便之门的时候，我又开始搞起来了。搞这种事情占去的时间不多，而且冒一点风险就可以把钱从对手那里给夺回来。”

显然，在燕妮的钱包里有了一笔不菲的收入，马克思本人也在精神上获得了一点冒险后成功的愉悦。然而他们的钱得赶快用来应付一张一张的帐单，无法再进入股市作鳗鱼般灵巧自如的转悠。况且，国际工人运动也需要马克思给以理论上的武装。

马克思 这位双目如炬的科学巨匠，它能看穿一切，洞察至微。对于股票，这个资本主义的伴生物，他并没有像操起快刀斩西瓜一样，将其斩得落花流水。他指出

“股份制度，它是在资本主义体系本身的基础上对资本主义私人企业的抛弃，它越是扩大，越是侵入新的生产部门，它就越会消灭私人企业。”

多么鞭辟入里而又一针见血，不愧是社会主义的开山鼻祖。当然马克思给我们关于这方面的论述还很多，它们从各个方面条分缕析了股票的两面性：

一方面，由于股票可以私人持有，它的私人性质不会从根本上消除；另一方面，由于凡是拥有股票的人都是股东，股份公司便有了社会资本和社会企业的性质，在所有权上，它自然与私人资本和私人企业相对立，是在资本主义体系内对资本家个人私有权的否定。

在这里，我们丝毫嗅不到半点火药味，也感觉不到现代一些社会主义理论家的那种对于股票的咬牙切齿的深恶痛决。然而遗憾的是，不知是由于疏忽，还是想成心考验一下他的后来者们，导师并没有给我们留下股票与社会主义联姻的任何直接的说明。致使股票，这个市场经济的宠儿，由于受到了资本主义的欢迎，便理所当然地受到了社会主义的唾弃。“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但谁又能说股票只能是资本主义才能培育的苗呢？

中国人对于股票的认识，始于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股份制经济，历史将记住潘强恩这个名字。

潘强恩是深圳宝安县万丰村的党支部书记。他读过《资本论》研究过股份制。一九八四年五月，他在支委会上提出发动群众参股办工业村。起初事情并不顺利，这个两年前人均收入百把来元的小村庄，现在刚刚有了两个热钱，谁也不想折腾。在党员、干部的带动下，全村陆续筹得现金 25 万元，成立了深圳农村第一家股份公司——万丰工业村。全村村民都成为万丰的股东。

至 90 年时 时光仅仅过去 6 年 全村 1800 人拥有固定资产 1.07 亿元。仅 1992 年 全村工农业总产值 5200 万 纯利润 1100

万。据统计，当时香港有一半居民的实际富裕程度和生活水平不如万丰人。

就是这个潘强恩，在《深圳特区报》理论版上宣称：

“在我看来，少数人拥有生产资料叫私有制，多数人拥有生产资料叫共有制。共有制和共产主义是一脉相通的，共产主义不是铁板一块，不是“一大二公”式的虚假公有制。共产主义是共有，共同拥有才可以共同富裕。

股份公司仅是手段而已，实现共有制才是目的。以前的体制弊病百出，名义上人人都是国家的主人，但事实上人人都不当或者想当也当不成主人。人们把公有制看成是“阿爹”，要么漠不关心，要么挥霍浪费。只有人人都成了股东，既是企业的劳动者，又是企业的所有者，化抽象的人人共有为具体的人人共有，人们才能成为名符其实的主人。一个村是这样，一个国家何尝不是如此。”

如果说 78 年安徽省风阳县“小岗模式”的出现宣告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传统体制在农村的寿终正寝，那么万丰模式则宣告了一种有别于公有制经济形式的共有制的朝霞，正在时代的地平线上跃动，鲜活而又亮丽。

### 春潮涌动 股票走进国门

1990 年 8 月。中国的改革在艰难中前进，治理整顿虽然效果显著 然而 扼住经济的那双大手仍让人感到捉摸不定。

此时，深圳市体改委、深圳大学股市联合考察组在万丰做了为期一个月的调查。他们在调查报告中不无悲怆地写道：

“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把生产资料私人占有改为社会占有，其本质意义在于提高生产资料的社会化程度，以适应生产社会化的需要。社会主义的已有实践证明：传统公有制虽然抛弃了生产资料私有制，却陷入了封闭的、僵化的体制中，社会的增量资产为条块所分割，不能按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组织

规模经营；企业的存量资产，没有优化重组的机制，生产要素不能在全社会流动。传统公有制没有带来预期中的生产资料社会化，没有创造高于资本主义的生产力。”

显然，为了打破条块分割、层层专权所造成的肠梗阻，企业进行了解绑、放权的先期改革，产生了一定的效益。可即使是最成功的改革措施，也只能在一定的历史时期里产生一定的效应。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发现企业的早、中期改革，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按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组织规模的问题，更没有触动企业没有优化重组的机制的惰性。改革开放后一直讲打破大锅饭，可现在不少企业锅里的饭已经所剩无几，或是刮亮了锅底，这口锅却依然结实。干部无论干好干坏只能升不能降，企业不管效益如何职工的工资只能加不能减。其结果是保护了落后，扼杀了进取，掩护了守旧，暗杀了改革，导致亏损象雪崩、泥石流一样大面积蔓延开来。

真正能搞好企业的突破口在哪里呢？

如果象万丰模式那样，把企业资产分成等额股份，化成股票的形式出售，让人民成为股票的持有者而真正成为企业的主人，以股东的身份来关心企业的经营管理和效益，并使企业转化成现代意义上的股份制企业，那么，旧机制下的企业弊病是否能摆脱得干干净净？

既然资本主义依靠股份制，克服了私人资本的矛盾，延续了奄奄一息的生命；那么，现代文明创造的股份制，会不会青睐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呢？

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总是很英勇及伟大。股票，这个有数百年历史的经济宠儿漂洋过海来到中国时，中国人何曾对其投去惊喜的一瞥。然而，于细雨无声中，股票已经走进了中国人的生活。

1984年11月18日，在现上海市委书记黄菊等领导同志亲自

关怀与支持下，中国第一个私人参股的有限公司在上海诞生：即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

飞乐音响股份公司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通过工商银行信托部静安分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股票 1 万股 每股面值 50 元 金额为 50 万元。

从走进国门到安家落户，短短几年时间，股票这个让人欢喜让人忧的精灵，到底在中国这片古老的大地上如何成长的呢？历史很快就给关心它的人提供了答案。

两年后，音响公司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完成销售额 150 多万元 实现利润 130 多万元。公司投标击败美国等 8 家实力公司，承建五星级上海锦江宾馆等工程。

1987 年 5 月，上海飞乐音响公司在全国银行首次对企业进行经济和信用评估中，被评为经济和信用一级企业。飞乐持股者两年获股息均在 15% 以上。

1987 年 10 月，当时中国人民银行行长陈慕华到上海视察工作。上海市委书记郑重而又自信的说：

“我们上海已有了一家——飞乐电声总厂股份公司——上不封顶下不保底的规范化股份有限公司。”

1985 年 1 月。上海延中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正式成立，并全部以股票形式向社会筹资，成为第一家公开向社会发行股票的集体所有制企业。

从此以后，上海股票市场从无到有，终于渐成燎原之势。1987 年 5 月 7 日，成千上万的人赶至静安区信托公司掀起了一股市民购股热。从这里，股票终于在华夏大地上显示出了其撩人的魅力。股票，不容置疑地走进了人们的生活，是喜是忧，现在看来已是一目了然。

深圳股市是在风雨中，探索中不断发育成长的。自深圳发行第一张股票以来 股市从无到有 由冷到热 从升到降 几经变化。

深圳股民也经历了风雨的洗礼与磨炼。

1987年5月。深圳市发展银行首次向社会公开发行股票。然而，一向精明的深圳人好象从一开始并不热衷于此。由于购买者寥寥无几，深发展计划发行195万股，仅完成发行计划的5%。

孰料世事变幻太快。1989年5月份以来，深圳股市又出现了发烧现象。各证券营业点前，人头攒动，买卖兴隆。股指一日千里，令人瞠目。当时5种股票价格短期内齐头并进，一升再升，股票市场市盈率最高点曾上涨到60-70倍。在股票最热时，曾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

一家老俩口，阿公想购买发展股票，阿婆坚决不同意。一场争议“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最后把全部家底5000元分成二分，阿婆拿了三千元存入银行，三年定期还本付息，看得见，摸得着，本息双收。阿公将2000元现金认购了发展银行股票100股，说是闲钱变活钱。股票虽有风险，但老者却相信不会血本无归。三年过去了，一千多个日日夜夜，阿公始终跟着发展银行股票自然滚动。包括扩股认购新股共投资5000元左右。按1990年11月26日该股市价每股75.03元计算，阿公手持发展银行股票市值高达37.65万元，剔除本金，转手之间可净赚37万元之多。

这位老者无疑是聪明的。对特区政府未来的信心，使他成为深圳股票市场第一代投资者中的幸运者。然而，历史总是按着其特有的规律运转着。有涨就有跌，这也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1989年12月中旬，深圳股市突然掀起一股强烈的抛售风。股民们从原来主动抢购股票转为争先恐后地抛售。由于当时股价的日停牌上升限价为0.5%，而日停牌下跌幅度则是5%，相差10倍，更促使股价急剧下跌。

1990年12月26日，在深圳市交通银行证券部等几个交易所内，窗口上所挂的“委托卖出”的牌子前，人们排起长队，人头攒动，只听见一片重复的喊叫声：卖出万科、卖出安达、卖出……。而在

委托买入的窗前则空无一人。

针对上述情况，经协商，市政府决定把股票交易涨落停牌制的日跌幅由 5% 调为 2% 但日上涨幅度仍是 0.5% 不变。此举使人们普通看好的金融股票——“发展股”也急剧下跌。据统计除原野股票外，4 种股票价格的下跌幅度在 18—51% 之间。此间香港《文汇报》称：

“深圳股市已正在迈向股灾的边缘。”

这也许有点危言耸听，但却不出人意料。其主要原因是深圳股票市场正处于由过去依靠行政管理转向依法管理，股票交易、分散过户转向按国际惯例的集中交易、集中过户的转轨时期，完成这个过渡非一日之功能奏效，而是需要一定时间和一个过程。过去比较落后的人工操作交易方式，还可以应付日常 200 万元左右的交易量，而今交易量上升了 10 多倍，与现时股票服务方式矛盾更加突出，因而股票交易中存在买不进、卖不出现象。这些现象引起部分群众的误解，更被一些人加以夸大，导致股民产生不必要的心理恐慌，诱发出新的“抛售风”。同时，也有的人散步和传播了谣言和不负责任的言论，对股市起了很大的干扰破坏作用。

谣言的破坏作用是无穷无尽的，即所谓的三人成虎。由于有关深圳市政府决定要干预上市公司 1991 年的派息分红及扩股的谣传，因而，表现在买卖上则忧气重重。更多的股民则对股市的涨跌幅度不对称失去投资信心。股民们普遍认为，日停牌升幅 0.5%，收益极小。尽管日停牌跌幅由 5% 调至 2% 但与日停牌升幅仍相差 4 倍，反差极大。相比之下得出的结论是：收益小，风险大，不宜买进。

行家认为，对于投资者来说，股市的风险与收益应是对等的，应通过升跌幅度对称来加以体现。与存款、债券相比，股票已具有极大的风险性。由于企业经营不善出现的风险和受社会经济、政治波动所引起的风险以及投资者本身预测所带来的错误造成的风

险，投资者理应承担、毫无怨言。但由于人为地规定，升跌幅度不等，实际上就增大了股票投资的风险，特别是在股市已发生了大的变化时，仍没有采取调整措施，这是有害的。其实质是鼓励人们只卖不买。

## ● 1992 三尺之冰化春水 数年之寒见晴天

冰冻三尺 总有冰销雪融的那一天。

数月之寒 也有云开雾散的那一天。

初生的牛犊不怕虎。初生的中国股市怕什么？

回首 92 中国股市 可用八字概括：

风里天涯 浪里流年。

风浪里尽显英雄本色，风浪里再现世事沧桑。

股市就如一杯酒 有人说它苦 有人说它甜。

走进 92 中国股市 你就会走进一个异彩缤纷的世界 有汗水和眼泪 有激动和狂热 这里永远是个负有多味人生的世界。

风物长宜 华夏大地股票热。

1992 年 对中国股市而言 是极不平凡的一年。

1 月 26 日 中共中央主席江泽民视察上海证券交易所。他那铿锵有力的话语，无疑是一缕春风，拂过波澜不兴的股市。

大地回春。世纪伟人视察南中国。“有人说股票是资本主义的。我们在深圳、上海先试验一下，结果证明是成功的。看来资本主义的有些东西，社会主义制度也可以拿过来用，即使用错了也不要紧吗 错了关闭就是 以后再开 哪有百分之百的事情！”

犹如一股热风，“南巡讲话”吹遍乍暖还寒的大江南北。经历了两年波谷的中国经济大幅升温。股市热在华夏大地油然升起。

海南：1992年3月26日，海南股票内部交易中心试业，28日全面放开股票，最初只有港澳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海南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海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三家企业的内部股上市，开市十多天，市盈率就达100多倍。海南民源科技股票更为有趣，该公司发行股票时，刚刚成立不久，尚无经营历史，自然无利润可言，甚至没有财务报表，就是这样一个基本是空白的股票，发行价为一元，上市伊始即炒到10元一股。堪称世界股市一奇。

贵州：深圳君安证券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在贵州举办股票知识讲座，连续几天，能容纳千人的礼堂座无虚席，场面之热烈，多年来极为罕见。未几，贵州资金大举进入深圳股市。

上海：交通大学靠近证券交易所，股市潮对师生冲击很大，学生手头没有资金，就去给炒家排队，每逢发行新股，一个位置可卖100元至500元不等。

鞍山：鞍山市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曾发行内部股票5000万股，先发出认购表5万张，每张可购1000股，假如有中签率，则是100%，一个月内，5元一张的认购表被炒至3000元一张。

厦门发行4家公司的内部股的认购表403张，每张5元，中签率为10.3%，短短数天，认购表被炒至400元一张。

股票的热浪很快滚过大江南北。新老股民如梦方醒，巨额资金虎视眈眈。市场日臻火爆，股价节节上升。

而当时的深圳股票交易所只有5家上市公司挂牌交易，上海则还是延中、真空电子、飞乐音响、爱使、申华、飞乐股份、豫园商城和浙江凤凰等所谓“老八股”坐庄。新股上市亟待弥补。于是围绕新股的发行与认购，92股市演绎了一出惊心动魄的人间壮景。悲剧耶？喜剧耶？硝烟散尽，自有后人评说。

1991年11月，深圳。十一家新公司股票发行在即，市政府打破以往发行新股的方式，决定采用一种公开、公正又少震荡的办法，即凭居民身份证购新股认购申请表，然后抽签，表上所填身份

证号码被抽中的人，可买二千股新上市股票。对此，有人称之为在国际上也尚属首次，鲜明地体现了中国特色。

然而，深圳还是被震荡了！犹如雨后春笋般满地冒出了打电话的，一个个对着三江五湖拼命地喊：“赶快寄身份证来！”一个个邮局，顿时成了海湾战争的伊拉克，每天被爱国者导弹般袭来的一包包身份证炸得天旋地转。更为严重的是，国家安全部门通知市政府，据内线报，全国各地的个体户提着装满身份证的麻袋，正马不停蹄披星戴月赶来深圳……

派表的前一天，从下午三点起，各个证券部银行门口，都有数十人通宵排队。排在前几名的人拿出一张纸要大家按顺序编号，希望单子送上去后，对方能给予承认，这显然是一种又想排队又想偷懒的办法。可这高明的办法很快被攒挤的人头给打断了脊梁，只能一个贴一个地站着。平时穿一身皮尔卡丹的衣服，沾上一点灰尘也心疼不已的绅士，此时任一双双油手、汗手在上面任意游弋；往日走在街上一双丹凤眼翻到额头上去的靓女，此刻却由着一双双粗手、茧手揽其蜂腰。水银泄地般活泼泼在街上走动的，唯有小商小贩了。一排队 吃不了饭 只得随行就市，一瓶矿泉水十元，一个往日几元钱的盒饭现在价格已翻了几倍，那份大胆就差没有把四周的空气也给算钱。

宛如打一场淮海战役，全市指挥中心以市长郑良玉为首的市政府领导亲自坐镇。随处可见悬着红蓝面包的警车，每一个网点都布有佩以警棍和步话机的警察，指挥中心耿耿虎视全市的二百九十九个网点，哪里一有异常景象，随时都能集中力量扑向那里。当表从各个银行的金库运出并启封后，派表开始了。一张身份证取一张表，每人至多可领五张表，长龙似的队伍在缓缓蠕动，队伍都不见缩短，排完一次，接着再排第二次、第三次。不少人家是倾巢出动，儿子排完二次，一边挥去额头上的汗水，一边向老子送去金子般灿烂的微笑 丈夫苦战一通宵 衬衣干了又湿 湿了又干 妻

子挺着个大肚子出门，蔚为壮观地继续战斗。直到中午，人们才发现自己钻了自己设的圈套。在暴风雨来临前乌云般聚涌而来的欲望面前，深圳市政府筑起了厚达三百万张的长城，表并没有派完。开始凭身份证领表，后来没有身份证也行，上午一元钱的表，下午有五毛钱照样卖给你，而且你买多少张都行。这一天；有 60 万人领走了 292 万张认购申请表。抽签结果，19.6 万人成为新股民，中签率为 4.6%。那几天，在深圳的街头巷尾，人们见面几乎只有一句话“你中签没有？”

“月儿弯弯照九州 几家欢乐几家愁。”某公司职员邱先生领了 100 张表 填了 98 张有效申请表，结果一张也没有中，他只能抱怨自己运气不好。有些人却难怪运气，一下领了几千张表，身份证尚没有寄到 筹不及了 打长途去问号码，一二张抽签抽中了 可身份证寄到，一对，那号码却写错了，还是不能认购。或者将多领的表卖掉后，自己的没中，卖掉的却中了。按当时的黑市行情，已中的一般公司股票的认购申请表，可卖到几千元，若是物业的，则可卖到 1 万元一张。按当时的股市行情，每张表可认购的二千股新股，若是没有抛出 已经赚了几万元。什么叫“后悔不迭”什么叫“沮丧万分”，这世界大概没有比他们感受更深的了。还有更冤枉的，抽签是由电脑进行，一个身份证只能填一张表，如填了两张，电脑就会自动将这一对重复的号删除，偏偏就有号码相同的表出现，据说是有人做恶作剧，自己买来的表没有那么多身份证好填，就乱填一气，以中国之大，人口之多，总有谁的号码会被撞上。被电脑拒签的还有，身份证少了一个号，或是那号码反映出的出生年月是：1966 年 16 月 8 日、1943 年 2 月 32 日……马虎惯了的中国人，也许只有到这时才会对那戴着大盖帽的官僚主义，从内心里发出野兽般的嚎叫……

也不是所有中了的人都快活。你借我的身份证去抽签，本来我是不打算买股票的，权当借个什么东西给你玩一玩。结果我的

身份证号码却中了，我当即失去了玩主的潇洒，整日里变了个小咬儿在你身边嘀嘀咕咕：

“你知道一张已中签表在黑市上卖多少价钱吗？”

你若是不领会其中的暗示，我就将自己的身份证要回来，而你则功亏一篑，没有了与中签表上的号码一致的身份证，便没有哪个证券商敢收下你购买股票的钞票，这种事情在当时屡见不鲜。有人找了同事的朋友的好朋友，借了一张身份证，中了，未等满脸雏菊般怒放的笑纹散去，后面三个人立即城下结盟，向前者提出，每人各买 300 股 这叫“要生一起生”。前者脸上的笑纹立马变成了怒纹 哗啦一声将表撕了 回对方一个“要死一起死”。

还有一个故事，主人公之一恍若祥林嫂再世，不知鲁迅先生地下有知，该作何感慨：

某公司的江女士那天正要去排队买表，同一办公室的王先生说了一句：“下午老板叫我去报关 如你方便的话 就给我也买一张表。”

江女士心想自己只有四个身份证，无需多排一次队，便爽快地答应了。五张表到手后，她细心地将每张表都给核对了一遍。她自己本身是个爱吃辣椒的四川人，现在她象个地道的广东人那样讲究起数字的谐音来，从深圳到广州的火车，如果车次的数字里有“4”哪怕是空调特快 大热天她也不坐 若是碰上 4 号、14 号、24 号座位等，她就会泰山顶上一颗松般地站着去广州，那份执著，叫原装的广东人也自叹弗如。这一校验，她发现了一张表的编号是“14”，犹如扔掉一个烫手的刚出炉的洋山芋，一回到公司即把这张表递给了王先生。王先生昨日回来，去几个网点转一转，见门口人山人海，他正要由衷的感谢几句，目光就落在了编号上，顿时腮帮鼓起，上下牙床使劲地咬着，那串诅咒的话语才没有飞出来。

抽签结果大大地调侃了这位江女士，她买的 5 张表中 四张未中，唯有给王先生的那张中了！她尚属薄面之人，没有向王先生提

出“要生一起生 要死一起死”只是此后便精神恍惚 神经失常 逢人喋喋：

“唉 我真傻 干吗就把那张表给了他呢 我真傻 你说我傻吗

这是个不该发生的故事。我们的证券市场刚刚起步，人们对它的认识亦刚刚开始。这里面的痛苦辛酸，悲欢离合，也许会使人感到惶惑抑或不安。然不管怎样，有些“不该发生的事”还是发生了，也许正是它们才使我们的证券市场具有了另外一种斑驳的色彩。

1991年1月。上海。浦东大众、异钢、众城实业等三种股票发行在即，准备采用的是凭本人身份证到指定地点领取预约券，再抽号认购的办法。指定地点之一的江湾体育场、虹口体育场门口，一天之间，耸起了座城中之城！涌动的市民，铁桶般围住了几个大门，眼巴巴地盯着正空空荡荡的场内，恍若这里就要举行夏季奥运会的开幕式。人们从上午等到下午，又从下午等到最后一抹夕照点亮了满城的华灯，不觉饥肠辘辘，未察风凉人寒，脑海里唯一的思量便是如何做一个游在墙里的鱼儿，以便尽可能挨近东大门。半夜十二点 大铁门哗啦一声打开 好似长江决口 犹如监狱暴动，在高强度的白炽灯的照耀下，近万人冲进场内。顷刻间，虹口体育场人满为患，又再度关上铁门，任凭外面几万人推推搡搡，呼天喊地。江湾体育场的铁门再度关上后，则被无数血肉之躯所筑成的铁流所撞破 混乱中 有人倒地 踩成重伤 叫骂之声不堪入耳 呻吟之声隐约可闻。鉴于未曾预料到此种情况，为安全起见，异钢、众城股票不得不宣告暂缓发行。

1993年3月 异钢、众城随另5种新股一起推出。上海市政府同样用心良苦，想来想去，发行办法改为向全社会推销股票认购证 每证售价30元 不须排队 没有指定地点 半个月之内 随到随买，且供应充足，只要你舍得放血，给你装一汽车运回家也成。但